Globethics Repository



兩次國際會議述評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ZHU, Xiaohong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2 00:10:0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010

兩次國際會議述評

朱曉紅（復旦大學哲學系講師）

一、「亞洲天主教會婦女神學論壇」（EWA）國際會議綜述

以「亞洲天主教會中的婦女：來自沉默群體的聲音」(Ecclesia of Women in Asia: Gathering the Voices of the Silenced，下文簡稱EWA) 為主題的亞洲天主教會婦女神學論壇，於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在泰國曼谷We-Train International House召開，來自印度、菲律賓、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緬甸、巴基斯坦、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越南、東帝汶、中國 (大陸)、臺灣、香港、荷蘭、澳大利亞、英國、德國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從事神學研究、草根神學實踐的六十餘名婦女參加了會議。

會議緣起於兩個東西方神學家的夢想。一年前，為回應教皇關於亞洲天主教會的教牧勸諭《亞洲會議》(*Ecclesia in Asia*)，在印度蒲納 (Pune) 召開亞洲神學家會議，與會的四十名代表中僅有四名女性。其中的兩名女神學家，來自印度的伊芙琳 (Evelyn Monteiro) 和德國的艾奈特・牟拉特 (Annette Meuthrath) 深受刺激，不由追問：亞洲的女神學家果真就是如此稀缺嗎？她們在關注甚麼？她們對大學神學教育、教會現實有甚麼思考和貢獻？如何讓這個邊緣

群體、被淹沒的聲音得到重視，成為這兩位神學家最大的夢想。於是，她們向亞洲各地的婦女神學家和教會婦女團體發起倡議，直接促成了EWA的這次論壇。

會議是以一個富有寓意的舞蹈開始的，來自馬來西亞的舞蹈家用肢體語言表達了婦女在各種羈絆下的苦難、掙扎、反抗、在主內的喜樂，清脆的瓦罐落地聲擊碎了沉寂氛圍，象徵着婦女的覺醒和打破沉寂局面的努力。繼富有特色的自我介紹、各與會國家的代表以本國語言進行的開幕禱告之後，伊芙琳博士致了開幕辭，介紹了會議發起的背景、目標和設立亞洲天主教婦女委員會的提議。她強調了會議的幾個目標：一、聯合從事學術研究的天主教女性神學家和推進草根神學思想的婦女活動家；二、讓天主教內的女性神學家的意見和思想充分發表；三、推動從亞洲天主教女性的視角進行的神學研究；四、鼓勵更多的亞洲、天主教女性進行神學反思、研究和寫作；五、創建亞洲女性主義神學／草根運動和全球的女性主義神學／草根運動之間的交流網絡。為了增進瞭解，會議的第一日下午，各國代表作了關於本國宗教和婦女地位狀況的報告。第二日是論文分享。第三天起，來自荷蘭尼梅爾根 (Nijmegen) 大學的女性主義神學家黎芙．托禾 (Lieve Troch) 博士就各國報告和論文分享進行了回應，指出亞洲婦女和世界婦女運動之間的共性，以及亞洲婦女神學可以從西方借鑒的方法。會議的最後一天各國婦女代表討論了EWA今後的活動內容，並推選了EWA的常務委員會，會議以一個沒有男性神職人員主禮的別開生面的聖餐儀式結束，象徵着亞洲婦女在主內的團結和聯合。

在會議召開之前，圍繞暴力、靈性、教會結構、聖經、跨宗教對話、環境－女性主義 (Eco-feminism) 與神學

方法等六個主題的三十餘篇會議論文已經在互聯網上張貼，大多數與會代表在赴會前都閱讀了本小組的論文。會議第二日是論文報告日。上午，代表們按照六個主題分為六個小組，宣讀論文，下午各組集中將各自的討論結果作分享。

有關「婦女和暴力」的主題，來自緬甸、菲律賓、印尼的代表們，就婦女整體的社會地位、婦女賣淫、家庭暴力、九八年印尼軍隊對華裔婦女的殘暴、剝削婦女勞動力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她們指出，亞洲婦女承受着來自社會男尊女卑的傳統結構、國家機器、資本化乃至天主教會等級制度等方面的歧視或侵害，如何對這些問題進行神學思考、對這種悲劇性的道德處境進行反思，是當前神學需要關注的問題。

有關「婦女和靈性」的主題，來自印度、越南、新加坡、菲律賓和韓國的代表們從各自國家婦女的處境或感受作為反思的出發點，以解放神學或婦女神學作為理論資源，提出婦女也分有神的形象，聖靈是婦女靈性力量的源泉，如何在具體處境中理解聖母論、尋找整全的人生是亞洲婦女不可回避的神學問題。

有關「婦女和教會結構」的主題，馬來西亞、臺灣、韓國、印度、印尼的代表均指出，儘管天主教會在改變，但是婦女在教會中仍然沒有決策權，在教皇-主教-神甫-修女-平信徒這樣一個秩序中，婦女深受教會男權、父權等級的壓抑，缺乏與男性平等的地位。婦女的自主意識、婦女運動的價值急需宣揚；與此同時，如何理解「上帝的形象」對男女觀念的塑造、如何理解教會的身分和訓導、如何理解聖經的權威都將是理解婦女與教會關係時要面對的重大神學問題。

關於「婦女和生態女性主義、神學方法」這個主題，韓

國代表Han Soon Hee(〔音譯〕韓素喜)指出，婦女和生態環境之間的自然的類比聯繫，雙方都在父權社會中受到宰制和盤剝，因此，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關注整全生命的原則。來自澳大利亞、新加坡、斯里蘭卡和菲律賓的代表們從各地婦女的生存經驗出發，指出女性需要找到新的神學範式來理解和發展道成肉身、宇宙論和教會論，婦女的這種追尋符合創造的真正目的，將豐富人類尋找生命意義的過程。

「婦女和聖經」的主題。來自巴基斯坦、菲律賓、中國代表紛紛指出，婦女地位的低下，不僅體現在社會現實中，也體現在聖經和聖經翻譯中。來自中國大陸的周輝女士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證明，在漢語新標點和合本聖經中，多處出現有意的增補或漏譯，體現譯者貶抑女性的男權主義立場。教會婦女需要用一種全人的(holistic)、女性主義的眼光來重新解讀聖經，這就需要從事聖經研究和草根運動的神學家的聯合。

「跨宗教對話」的主題。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的代表分別從各自國家的宗教狀況出發，指出跨宗教對話不僅可以增進彼此的瞭解，也拓展了草根運動的領域。隨着全球化經濟體系的建立，婦女貧困問題和對婦女的勞動力的剝削加劇，在以佛教、伊斯蘭教、儒教和印度教為主要宗教的亞洲，教會婦女須要和其他信仰的姐妹一起尋找對策。

來自荷蘭的神學家黎芙·托禾博士以觀察員的身分對上述報告作了回應。她首先指出，在男性佔主導地位的亞洲教會，EWA就是亞洲教會婦女這個少數團體尋找自己地位、發出自己聲音的努力，但是，她善意地指出，亞洲婦女自身的身分認定不能僅僅停留在「受害的弱者」上，亞洲婦女神學也不能停留在描繪亞洲婦女受壓迫的現實表面，它更要指出婦女自我更新的道路，「亞洲婦女神學的

目標是婦女自身、社會和教會向ekklesia（一個自由公民在神治下享有平等生命的民主集合體）的更新」。這就要求神學方法和神學語言的自覺。作為一個曾在斯里蘭卡、印度和印尼等亞洲國家和巴西從事神學教學和草根神學實踐的女性主義神學家，托禾博士指出，亞洲女性主義神學必須要擺脫西方傳統神學的束縛，大膽地進行文化反思、批判、重構，尋找有亞洲面孔的基督形象的基督論，建立亞洲處境化的聖母論、教會論、婦女靈性學。她還建議EWA今後要與南美、非洲等地的教會婦女團體建立橫向交流和聯繫。

與會代表在最後一天「EWA將走向何處」的討論中紛紛表示，回國後將EWA網絡體系保持暢通，希望EWA常務委員會能利用自己的資源推進各地本土化神學的建設進程，並在有關地區開設女性神學課程。

本次會議主要得到了法國巴黎天主教反饑餓和發展委員會（CCFD），德國傳教學研究所（MWI）和瑞士the Swiss Lenten Campaign Fund的贊助。來自中國大陸的兩位年輕女學者：周輝博士（原人民大學中文系教師）和朱曉紅博士（本文作者，復旦大學哲學系教師）在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推薦贊助下，分別以論文提交者和會議特約觀察員的身分，參與了此會。其中周輝博士的「從女性主義視角反觀中文和合本聖經」的報告引起了與會代表的興趣。會議的五位主要負責人高效有序的組織能力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組織者盡可能地讓每一位代表發揮各自的特長，參與和組織會議，發出「聲音」，真正體現了讓亞洲婦女「打破沉寂」的會議宗旨。另外，這次會議的形式非常豐富，學術論文研討只是會議議程的一部分，各國代表主領的帶有本土特色的崇拜，帶有亞洲地域特色的歌舞，各國代表佈置的內容豐富的本國風情展示台……，都體現

了這個以女性為主題、婦女代表為主體的亞洲婦女會議感性的一面。

正如代表們所指出的，無論是受儒教，還是受伊斯蘭教、佛教影響的亞洲國家，對婦女角色的期望都非常接近，比如內斂、溫良、順從這些亞洲各國傳統中的女性美德，婦女受制於傳統的社會性別規範，對階級、兩性、種族、宗教等的不平等現象視而不見，忍受各種暴力的凌辱而不能自覺。也許還由於大多數代表來自天主教會，在教會男權等級制度下女性備受壓抑的緣故，因此，會議中許多代表都着重描述和陳列了這樣的事實：亞洲婦女無論在宗教、政治還是經濟的現實生活中，都是「受害的弱者」。然而，對自身地位清醒的評估和認識雖然必要，可停留在對現實的描述和控訴是不夠的，如神學家托禾博士所言，這無疑又陷入了自己設置的不平等陷阱，最重要的是指出「自我更新的道路」。在這次會議中，各國報告和提交的論文中，描述性居多，問題提得多，而真正能夠對問題進行高屋建瓴的分析，並且從社會結構、靈性實踐等角度提議改善之道的並不多。這也恰恰體現了EWA和其他類似的團體推動女性草根神學、鼓勵教會女性進行神學反省的必要性和價值。

最後，會議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饒有興味的現象。本次會議特請了一位西方女性主義神學家作為顧問，她一方面大力抨擊女性神學中的"helping"(「扶持」——也即把聽眾當作是需要幫助的弱者)語言，但是另一方面，她還是用了兩個半天的時間介紹西方女性神學的方法，與會者都成了扶持的對象。不由令人發問，反映亞洲女性神學家聯合的EWA大會、乃至其他相關的活動或領域，何種方式才能讓亞洲女性根植東方語境、真正發出自己的聲音？

二、「亞洲處境化的神學教育——神學教育課程評估」

「亞洲處境化的神學教育——神學教育課程評估」(Teaching Theology in Asian Contexts: A Conference to Evaluate the Curricula) 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一至六日在泰國曼谷召開。此會由德國亞琛天主教傳教學研究所 (簡稱MWI) 發起，由MWI和香港新教機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研究所 (Asia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共同贊助，旨在令亞洲神學教育能結合具體處境、反思一些基本問題，諸如神學教育的具體內容應該是甚麼？教育的對象是誰？由此推進跨文化、互文本的處境化神學的發展。

在基督教差傳史上，第三世界國家的神學常常不自覺地成為歐洲或北美神學的翻版。近半個世紀以來情況有些改觀，這些國家結合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特徵，發展出各具特色的處境神學。但是根據MWI全球性的調查，這些本土神學並沒有很好地融入神學院或大學的神學教育中去，而神學院和大學則是形成、發展和延續神學傳統的重要場所。因此，對這些學術重鎮、尤其是神學教育課程進行評估就顯得非常必要。本次會議圍繞着這個宗旨，組織了以下三方面的論文：各國處境化神學或神學教育的現狀、處境神學的女性主義視角、處境神學和神學教育的理論關係，進行報告。會議以論文報告、專題討論和專家述評三種形式，不斷深化與會者的關於該主題的認識。

十二月二日簡短的開幕式之後，會議進入論文報告的第一部分：各地神學教育處境化狀況的報告。復旦大學哲學系教師朱曉紅博士 (本文作者) 在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推薦和贊助下參加了會議，並在該單元作了題為「復旦大學宗教教育的實踐」的報告。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印尼、日本、韓國、臺灣、香港、菲律賓等國家和

地區的代表，對本國本地的處境神學的特色、並這種神學(已經或將會)如何影響神學教育課程，作了內容豐富的報告。會議的論文報告的第二部分——從女性主義視角談論處境化神學和神學教育——內容比較單薄，僅有兩位代表，分別來自印尼和香港，就神學教育和女性辦刊等實踐問題作了探討。會議論文報告的第三部分是在第二天進行的。來自印度、斯里蘭卡、菲律賓、印尼、日本的代表，都就處境神學和課程設置的關係進行了論述，由此展開了相當激烈的關於「甚麼是處境神學」的討論，這場爭論一直延續到是日下午的專題討論。會議的第三天，代表們由甚麼是處境神學的爭論，進入到與會議主題更密切的爭論：處境化神學如何影響神學教育。會議最後一天則是由來自菲律賓、印度和韓國的神學家進行總結。

甚麼是處境神學是各代表們爭論的焦點。來自香港的代表關瑞文認為，在談論「處境化神學」的時候，必須要澄清在甚麼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譬如至少有以下幾個層面的區分：一、神學都是有處境條件的；那麼，有些處境並不一定都是好的，因此處境神學就有好有壞。二、處境化神學就是改造現實世界的神學；那麼，在這個意義上的處境神學與實踐、教牧神學關係很大。或者，三、處境神學還意味着人們如何理解福音在具體處境中的意義，這個層面是大家都可以認可的。韓國代表權鎮愷提出，處境神學意味立足點是處境、具體的社會團體、被剝削和壓迫者，比如韓國的民眾神學、印度的Dalit神學就是這樣的處境化神學。更多的代表指出，處境不僅僅意味着地域化，全球化也是當前的處境；處境不僅僅是具體的文化或宗教，還包括政治、經濟等要素，而處境化神學更是一種做神學的方式，是針對社會熱點問題進行回應的神學。印度代表更

指出，處境神學似乎可以稱為第三世界的神學，是亞、非、拉美神學的總稱，只有這些國家才講處境神學。

涉及到處境神學教育，代表們提出了一些問題，比如處境化神學觀與普遍的神學觀的關係。具體地說，處境神學與基礎神學、古典神學、聖經神學、教義神學等這些概念或神學分支有甚麼樣的關係？另外，處境神學到底是在內容還是方法上影響神學教育呢？如果說處境神學是某種方法，那麼，人們在進行神學教育時需要有甚麼特別的技巧？如果說處境神學具體影響了教學的內容，那麼這些處境是甚麼？

來自印度的代表安托·柯米 (Anto Karokaran Cmi) 從印度本土神學發展史的角度，非常清晰地闡釋了幾個相似的概念。他指出，處境化 (contextualisation) 是一個特殊的概念，和適應論 (accommodation) 、吸收論 (assimilation) 、本土化 (indegenization) 是有區別的。適應論是指福音在傳播到印度的早期，傳教士在策略上、外在地迎合印度文化、宗教或社會精英的某些特點；而吸收論是接受了其他文化或宗教的某些要素，當然這是在對其他文化進行好壞評價之後進行的。十九至二十世紀初的印度傳教士就是採取這種立場，其他的文化或宗教在他們眼中構不成完整有效的體系。本土化在梵二會議之後非常流行，但是它只停留在外在的層面 (如禮儀的本土化) ，無法與現實的文化和變動的人群真正的結合起來。處境化則尊重其他宗教的完整性，並在各種人群的歷史處境中見證、宣講和分享福音；因此，真正的處境化神學不是僅僅指出於適應、消化或本土化而產生的神學，它還必然是一種跨文化、互文本的對談神學。

馬尼拉大學的何塞·梅瑟 (Jose Mesa) 總結回應說，很

難說處境神學有甚麼同一的模式，但至少人們可以說一點，人們必須要在處境和福音的互動中來作神學。處境神學必然要關注被壓迫者和社會邊緣人物的呼聲，聆聽聖靈在人類歷史和世界中的聲音。傳統觀念將神學看作是現成的、永遠正確的、可以代代相傳、普遍適用的真理，而處境化神學則特指這樣一種對傳統神學觀和神學方法的批判的神學，它是自下而上的，從人們的具體經驗、處境出發的。

代表們指出，儘管處境(文化的、宗教的、歷史的、性別的、社會的因素)決定着神學語言的意義，但處境神學的目的就是理解並改造所處的現實，它對教師、學生、教會、社會都將是一種持續進行的改造(transforming)過程。在神學教育中，處境化神學不是一門課程，或者是神學課程的一部分，它涉及到眾多的學科，是貫穿在所有神學教育、神學活動中的方法。來自印度的伊芙琳·蒙特羅(Evelyn Monteiro)指出，處境神學其實就是要在具體處境中理解福音，故此必然會涉及解釋學的懷疑和批判，並由此而進行解構和重構。菲律賓的代表伊曼紐爾·古曼(Emmanuel Guzman)指出，處境神學方法可以分為三個步驟：參與現實，在處境中經驗感受；在福音的光照下進行判斷，這時解釋學的懷疑、內心的感恩是兩個基本的態度；最後將判斷和重構的結果付諸行動、改造現實。

代表們還指出，亞洲的處境神學必須面對亞洲自身的處境和現實，亞洲的神學教育可以借鑒多元宗教的寶貴資源，如東方文化和宗教中的一些感性形式可以豐富學生的想像力；神學教育要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的神學與整個社會休戚相關，讓學生介入整個社會發展的潮流中去。傳統的神學教育對象(主要是天主教會)需要改變，平信徒神學家

的塑造理應是神學教育的成果。代表們還就神學教育中的師資配置、師生關係模式等進行了探討和交流。

本次會議有四十多名參加者，分別來自十四個國家和地區，有天主教、新教的神職人員；大學、神學院的教師或神學研究機構的研究員，也有從事草根神學的神學家。不少代表表示，要把會中學習到的經驗帶到自本國本地的神學院教學實踐中去，今後還要加強交流，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徐洸善博士當即表示願意將各代表提供的課程大綱公佈在本所的網站上。代表們一致認為，普世的救恩必須在當下的處境中予以理解和體現；同時，這種多元化的神學 (theology as theologies) 只有在對話交流中才能真正繁榮起來。本次會議就是這樣一次跨文化的神學對談。

會議過程中，有一個問題曾引起了多次爭論，這也許值得漢語神學界關注，那就是，處境化過程中，如何解決福音的獨特性和處境的世俗性之間的矛盾。

純粹從差傳的角度看。在一個充滿異質文化傳統和宗教傳統的社會中傳播福音，如果一味地強調適應、吸收和本土化，強調從處境出發對聖經和傳統進行解構和批判，那麼，重構出來的結果勢必是一種過於自由的神學，與世俗的社會變革理論、文化哲學沒有多大區別，缺少靈性解放的力量。另外，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到人們應該如何恰當地理解「處境化」神學的性質，還涉及教會應如何確立神學教育的方針：怎樣才能更好地在福音的光照下、聖靈的帶領下，傳承正統信仰，更新教學模式，事奉教會和社會。

從基督教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大陸的神學研究與海外的神學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教會體制外的研究者比教會體制內的研究者更加有活力，這是否可以看作是處境化

的漢語神學的一個特質？若干年前，教會內外對「文化基督徒」現象的評估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立陣營的觀點旗幟鮮明。對這個現象的不同意見還會繼續，然而從整個亞洲教會的現實經驗來看，即便是在漢語基督教研究領域，實踐和對話同樣是最切實的道路。